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及其当代寓意

肖 新 发

[摘 要]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唯物史观,而且在实践上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创造性地运用“历史合力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形成了“四位一体”的总体观、统筹兼顾的协调观、永续发展的生态观和以人为本的主体价值观,为这一理论赋予了当代意涵。

[关键词] 恩格斯;“历史合力论”;当代寓意

[中图分类号] K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9)05-0558-06

恩格斯的一生,不仅与马克思共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在其晚年以书信的形式阐述了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点。恩格斯在1890年4月21日(22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提出了“历史合力论”的光辉思想。之后,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的信中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历史合力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系统论和社会有机论的新发展,其内涵十分丰富,思想极为深刻,主要包括“历史合力”的整体论、层次论、过程论和主体意志作用论。一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合力论”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自觉地、创造性地运用这一理论,并为其赋予了当代意涵。

一、从“历史合力”的整体论到“四位一体”的总体观

“历史合力论”着眼于社会的系统分析,把经济、政治、文化等作为社会运动的一个有机整体。针对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教条主义者所宣扬的“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恩格斯明确地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1](第695-696页)在这里,恩格斯从社会构成要素的整体出发,阐明了“历史合力”的整体论思想,即社会发展的动力,不仅有作为决定性因素的经济力量,而且还有上层建筑的力量,诸如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等等。尽管后者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但它对于社会历史进程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如果仅仅从经济的角度研究社会的发展,甚至于把经济的要素视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则必然导致社会发展问题上的形而上学。恩格斯的这些思想,坚持了历史辩证法,既肯定了经济因素的终极决定作用,也阐明了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为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导。

自觉地运用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于社会主义建设中,首先必须在思想认识上防止和克服单打一的倾向。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完

全搞清楚, 舍本逐末, “以阶级斗争为纲”, 其结果是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 人民吃了很大苦头。改革开放后, 我们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扭转了乾坤, 增强了综合国力, 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但在一个时期内又不同程度地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 即邓小平所说的“一手硬, 一手软”的倾向。在经济建设过程中, 一些地方也发生过片面追求经济效率而忽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等问题。虽然在社会主义发展上改革开放前后发生的问题在性质上并不相同, 但却具有共同的认识论根源, 即都没有准确把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社会主义发展没有形成恩格斯所说的“合力”。前者离开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 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革命摆到了不适当的位置; 后者重视经济的发展是完全正确的, 但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之间没有形成必要的张力。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 正确理解恩格斯“历史合力”的整体论, 有利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恩格斯“历史合力”的整体论看来, 经济、政治、文化是社会构成的基本要素, 对于社会发展具有综合效应。这一理论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 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总体上说,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上保持了这种理论的自觉, 特别是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突出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党的十六大前夕, 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科学命题。在党的十六大,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思想得到进一步阐发: 一方面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体系出发, 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另一方面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结构的布局着眼, 着重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观的确立, 标志着我们党把对社会文明整体结构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从而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实现了由“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到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三位一体”的历史性飞跃。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共产党人, 创造性地运用恩格斯“历史合力”的整体论思想, 进一步形成了“四位一体”的总体观。胡锦涛指出: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 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3] (第1版) 按照“四位一体”的总体观, 集中力量发展经济,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物质基础, 也是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长治久安的物质基础。然而, 经济并非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力量, 政治上层建筑、思想上层建筑以及社会和谐都是社会主义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不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 也是社会主义社会优越性的根本体现。只有建设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才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必然要求, 是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迫切需要。只有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才能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 也才能有力地抵御各种腐朽落后思想观念的渗透和侵蚀。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只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才能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提供重要条件。可见, “四位一体”的总体观, 不仅揭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而且创造性地把“社会建设”摆到了重要位置; 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社会主义发展格局科学设计的观念体现, 而且凸现了恩格斯“历史合力”整体论的当代寓意。

二、从“历史合力”的层次论到统筹兼顾的协调观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在对社会要素的分析上表现为“合力”的整体论, 而在对社会结构的把握上又表现为“合力”的层次论。如果说, “历史合力”的整体论着重于对社会构成要素全面把握的话, 那么, “历史合力”的层次论则突出揭示了社会构成要素、动力层次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及其互动关系。从恩

格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合力”是有层次的:作为社会发展最终动力的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基本动力的社会基本矛盾;作为阶级社会直接动力的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精神动力的思想文化;作为社会发展主体的人民群众。社会动力的不同层次,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在社会发展中显示出特定的功能。它们表征着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人的相互关系,即是说,不同层次的动力并非孤立存在、彼此无涉,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通过偶然的事件为必然性开辟道路。正如恩格斯在谈论历史创造的前提和条件时所说的那样,政治等等,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在历史发展中也起着一定的作用。经济的、政治的,以及思想文化的“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1](第 696 页)。社会动力的不同层次是由其领域的特点和适应的范围决定的,它们的区分具有相对的意义。由于其各自特点和规律而自成系统,又由于其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而互成系统。恩格斯“历史合力”的层次论,既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必然性),又反映了历史动力层次关系的多样性和关联性。这一思想,经由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运用和创新,以统筹兼顾和协调发展的新观念丰富了其理论内涵。

统筹兼顾与协调发展,二者既有区别,更相联系。前者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后者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协调发展,即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为了协调发展,必须统筹兼顾。只有统筹兼顾,才能协调发展。为此,必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可见,协调发展要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不同层次,以及社会构成中的不同要素、方面和环节,保持张力,既按照各自的特点和规律健康发展,又促进其他层次、要素、方面和环节的共同发展;统筹兼顾就是要正确处理社会关系尤其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通过建立和完善利益调处机制切实化解矛盾,实现公平正义。这些思想,涵盖社会动力层次的不同方面,具体阐明了不同动力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构成了统筹兼顾的协调观。

统筹兼顾与协调发展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观念,是基于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有机整体的基本层次和非基本层次相互关系及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意义的准确把握而提出来的。从“历史合力”的层次论来看,统筹兼顾和协调发展,必然要求正确处理基本层次与非基本层次的关系。经济、政治、文化是社会结构和动力系统的基本层次,所以,我们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全面发展。进而言之,在社会构成的基本层次中,经济力量具有归根结底的终极意义,而政治、法律、思想意识则具有派生意义并对于经济力量具有反作用关系。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然而,“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1](第 732 页)鉴于经济力量在社会动力系统中具有归根结底的终极意义,所以,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鉴于政治、法律、文化等等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所以,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推进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整体的非基本层次主要指社会建设,包括人口、家庭、就业、阶层、城乡、区域、社会组织等社会管理和社会政策等。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关系,有利于把握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的发展变化及其趋势,有利于深入认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我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进而更好地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现实表明,随着社会转型进程的加快,农业劳动者大幅减少,城市劳动者大量增加,新的社会阶层发展较快,就业压力呈现上升趋势。因此,优化社会整体结构必须搞好社会建设,切实解决新出现的各类社会矛盾和问题。由此看来,社会结构基本层次和非基本层次具有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注重非基本层次和派生层次的作用,往往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基本层次、终极层次的作用。当代中国,突出社会建设,强调不同方面的统筹兼顾,其目的在于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各个环节

各个方面相协调,推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协调。过去,我们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强调的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这些社会构成的基本层次。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作为社会非基本层次的社会建设,强调社会构成基本层次和非基本层次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这一新思想,为恩格斯“历史合力”的层次论赋予了新内涵。

三、从“历史合力”的过程论到永续发展的生态观

恩格斯指出:“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1](第697页)社会与自然一样,表现为一个历史过程。社会发展的动力与社会发展的过程是统一的,动力贯穿于过程的始终,过程是动力作用的寓所,过程的持续发展是动力综合作用即“合力”的表现和结果。社会发展动力与社会发展过程的相互关联,既表现为不同要素之间的必然联系和相互作用,也表现为发展阶段之间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辩证统一,正是这些显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恩格斯关于“历史合力”的过程论思想,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永续发展的生态观上得到了生动体现。

永续发展的生态观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从总体上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遵循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注重了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但某些地方或某些时期也曾经发生过忽视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现象,其表现主要有二:一是只讲主观热情而不顾客观规律,以改变落后面貌的良好愿望代替经济建设和物质文明的客观进程;二是只顾过程的阶段性而不顾过程的连续性,以牺牲长远利益为代价而换取一时的所谓“繁荣”。由此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结果事与愿违,导致了社会主义发展不应有的损失。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社会主义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审视,逐渐确立了永续发展的生态观。

永续发展的生态观也是合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思想升华。早在我国改革的初始阶段,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就指出了中国社会存在的突出矛盾: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这是制约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因素。中国的耕地约占世界总耕地的7%,而人口则占世界总人口的22%,许多资源位居世界后列,即使某些资源总量可观,但按人均计算则不容乐观。况且,多年来,我们对资源的利用和开发不合理,造成了很大的浪费,破坏了生态平衡。历史和现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生产生活环境恶化、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那么,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就难以实现。永续发展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党的十六大把可持续发展列入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新世纪新阶段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又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推进科学发展的一项基本要求,党的十七大则从多方面对可持续发展进行了进一步发挥。就基本内涵而言,可持续发展强调生产、生活、生态的文明发展,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就基本目标而言,可持续发展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在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方式等方面基本形成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新格局。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构成了永续发展生态观的基本内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历史合力”过程论的认识跃进到了一个新水平。

永续发展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形成“合力”的客观要求和生动体现,而永续发展的生态观则是对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观的合理吸纳与创新。我们知道,可持续发展观形成于20世纪后期,由于它是人类对自身生存环境、生态环境的新认识,因而迅速地得到全球的响应,成为各行各业的行动指南。可持续发展观,关心环境和资源,最终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而是一种为了人的发展而促进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协调互动的社会发展模式。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永续发展的生态观,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把物的力量与人的力量有机地统一起来、把自然力量与社会力量有机地统一起来,要求当代人顾及后代人,从只有一个地球的角度重新审定和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从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正因如此,它是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世界上的事物都处于永恒发展过程之中,不同的发展阶段构成发展链条的必经环节,作为开放的系统,发展必然由现实走向未来。永续发展的生态观要求人们立足现实,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既重视经济增长指标、又重视资源环境指标;永续发展的生态观更要求人们面向未来,避免发展上的短视行为,在处理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的关系上,当代人要着眼长远,造福于未来,不应为了当前的发展而无限地掠夺后代人应该享有的自然资源,不应为了当代人的权益而无限地侵夺后代人的权益。所有这些思想,对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也丰富了恩格斯“历史合力”过程论的内容。

四、从“历史合力”的意志作用论到以人为本的主体价值观

如果说“历史合力”的整体论、层次论、过程论更多地着眼于物的因素的话,那么,“历史合力”的意志作用论则强调的是人的因素。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创造历史中发挥着极大的能动作用。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交错的力,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1](第 697 页)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历史结果”产生于单个意志的人的合力,而单个意志的人都是社会的人,是为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水平所制约的人,因而单个意志的人必然具有整体意志的社会制约性,即使是处于历史事变中心的伟大人物也不例外。尽管如此,单个意志的人对于“历史合力”的能动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恩格斯“历史合力”的意志作用论,形成了“以人为本”的主体价值观。

意志是主体能动性的重要表现,然而,人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志是相互交错的”^[1](第 732 页)。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作为分力的单个人的意志之间相互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是如此。随着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多发多样的状况,这是我国社会深刻变革中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从主体方面来说,在于主体意志的“相互交错”,亦即主体价值的多元化。基于此,正确处理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必然要求深入分析产生矛盾的深层次原因,注重从源头上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的发生。在现实着力点上,不仅要特别重视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而且要特别重视对人民群众进行共同理想和信念的教育,用科学的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一人们的思想和意志,形成既有利于每个人的个性发展,又有利于同心同德谋发展的正确价值取向。

主体意志的多样性与主体利益的多元化密切关联,在现阶段,人民群众利益结构呈现多元化特征,而这种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又来自于主体结构、主体意志的多元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新变化,不同阶层的主体既有共同利益,也有不同利益;既有共同意志,也有不同意志。能否兼顾主体利益结构、满足主体利益多元化需求,关系社会主义的发展全局。从价值观来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所有政策、措施和各项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3](第 279-280 页)利益是主体价值的表征,也是主体创造价值的内在动力。鉴于主体意志的多样性和主体利益的多元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既要强调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更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切实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人民群众是价值主体, 又是实践主体, 二者统一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实践是价值的源泉, 人民群众只有作为实践主体才能成为价值主体, 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才能创造价值和实现价值。胡锦涛指出: “全国各族人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 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保证, 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全部奋斗的最高目的。”^[1-4] (第 13 页) 作为实践主体, 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的承担者和创造者; 作为价值主体, 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成为党全部奋斗的最高目标,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利益、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提高人民群众的主体素质, 构成了以人为本的主体价值观的具体内涵。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2] 胡锦涛:《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载《人民日报》2005 年 6 月 27 日。
- [3] 《江泽民文选》第 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 [4]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3 年版。

(责任编辑 涂文迁)

Engels' “Historical Joint Forces Theory”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Xiao Xinfu

(Marxism Research Institute, Hubei Second Normal College, Wuhan 430205, Hubei, China)

Abstract: Engels' s “historical joint forces theory” not only enrich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ory, but also made far-reaching effects for the Socialist movement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practice. The contemporary CPC gives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to this theory by adapting the “historical joint forces theory” to the great practice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sciously and creatively, forming the overall point of view of “four-in-one”, the coordination point of view of overall consideration, the ecological point view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subject values point of view of putting people first.

Key words: Engels; “historical joint forces theory”;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